

傅山何许人也?今天的年轻人大概知道的已不多。两年前,美国波士顿大学白谦慎教授写了一本《傅山的世界》(三联版),虽然是专述傅山的书法,但涉及明末清初的社会意识、官场风气、士族心态,以书法看中国,写得颇有深度。其中印象较深的是,当文人墨客纷纷以字画迎送官员时,唯独傅山拒绝献媚。中国的书法本是陶然自乐之物,但在千年传统中也渗透着士族的奴性,这是白先生的见地。

今年是傅山逝世400周年,太原实验晋剧院青年剧团推出一出《傅山进京》,纪念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级人物。这次他们携剧来上海参加国际艺术节,虽然只演了两场,剧院也有些局促,但场面热烈,舞台上呼应默契,十分感人。傅山扮演者谢涛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和文化部“文华表演奖”得主,她把傅山的民族气节、平民情怀、艺术才华、独立人格融为一体,表现得淋漓尽致。布景、音乐也很有

今日几人识傅山

欧阳丹青

现代感,又充满中国韵味。唱腔激越粗犷,而又圆润工细,使不熟悉晋剧的上海人享受了新鲜的艺术,又有一见如故之感。

重要的还在于阔别了400年之后,傅山重又回到了舞台,回到了民间,回到了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分子中,正如剧组在演出前所说:“傅山以他不屈的秉性和锐利的民主思想锋芒行走在历史的烽烟中,傲立于明清两代的潮头,他宽广的学术领域,精湛的医道医术,卓越的书画成就,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可惜,400年来,这份遗产并没得到很好开发和弘扬,这或许与历代封建统治者并不喜欢傅山的民主思想和他刚正不阿的性格有关,也与中国士族阶层依附王权、缺少独立意识有关。《傅山进京》中傅山唱出一句“明亡

于奴,非亡于满”时全场掌声雷动,让人振聋发聩,这是一个痛苦的灵魂对时代清醒的认识,从后人评价“明代养士三百余载,独(傅山)先生为中流砥柱”,亦可见一斑。

当然,在《傅山进京》中,也刻画了康熙皇帝作为一代天骄遥遥先行于时代的眼光,他最后放傅山回归故里,显示了其尊儒惜才、海纳百川的天子气度,在那个时代也是不同凡响的。

傅山这个人能不能最终为更多人认识,成为我们民族学习的先贤,取决于像白教授那样十年磨一剑的学者有多少;取决于像太原实验晋剧院这样的团队的功力,不只是晋剧,比如小说、电影、京、昆、话剧等等;也取决于对好作品认识的水准和推广的力度(如果这出戏能安排在大剧院演效果会更好)。说到底,都与人人有关。在经济起飞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还要有许多条件,但最重要的无非两条,一是开明宽松的环境,二是人的原创力和敬业精神。这也是《傅山进京》给我们的启示。

徐光启在家乡念书时,学的是尧舜周孔,在塾间课徒教的也是这些,一直到加入了天主教,拜利玛窦做老师,仍说他“所持者尧舜周孔以来相传矩矱”,不赞成“不托飞驰而致千里,不由舟楫而渡孟津”虚空的庄老之学。学了些“天主实义”,意在“补儒易佛”。他是以“儒”近“耶”,以“儒”化“耶”,骨子里还是“儒”。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所以凡是有实用价值的,他都要学,传教士带来的数理、水利、测量、历算等等,他都要学到手。

他又是一个极认真的人,要做,就一丝不苟地做。他做京官时,正值满洲后金有很大的举动,扩张之势可能有一天威胁到“皇都”的安全。于是他受命练兵。按常理说,这对他不是强人所难吗?你凭什么能做这件事呢?果然,有人说闲话了:一个文职官员,练什么兵呢。徐光启却不这样想,身为朝廷大臣,义不容辞。他受命也有他的基础,因为他在家乡看过兵书。

为什么看兵书呢?前些日子,我去了一次洋山深水港,那可是高度现代化的硕大工程,吊装集装箱的一排排吊车,威风凛凛,很骄傲地向人们展示,这里是通向世界各地的码头。不过倒回四百年,可不是这个样儿。小洋山的巨石块,壁立在杭州湾,白浪滚滚,水光接天。就在这一眼看不到边的水域里,时时有海寇出没于浙闽沿海;其中倭寇经常侵扰上海这一个当时江南小镇,人们肆虐横行,使这个地区得不到安宁,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朝廷派了像戚继光这样的大将去剿杀。但海寇聚散灵活,重兵一时也剿不干净。

少年徐光启看在眼里,便寻一些兵书来看。看来他并不曾参加剿杀海寇和倭寇的行动,至少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但可以推想,对于青年徐光启的印象一定是很深刻的。不料,几十年后居然奉御旨真的练起兵来了。照我看,光启先生实在有点书生气,那是个什么天下呀!派到辽东去的多员大将都不

顶用,朝廷上下一团漆黑,腐败透顶,你老先生却不知深浅。

徐光启认真地干起来了。先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大明朝”将不将,兵不兵;不要说上战场,就是一旦有事,保卫“皇都”也难以胜任。于是他开始作“计划”,给他翻译《几何原本》那样,倾力为之。像皇帝上一个一个条陈,非常具体细致地反反复复地陈述他的建议。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从各处选调能兵强将,领兵的将军要有责任心,指挥能力强,用现在的话,就是素质和水平要高;兵士同样要有合格的训练。另一条是改进武器,很重要的一点是要配备大炮,自己造一时有困难,可以先到澳门去买葡萄牙造的大炮。类似的条陈、奏疏上了一道又一道。皇帝的御批都是:“知道了,欵此!”

日子久了,光启先生着实有些为难了。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文恬武嬉的官员只是看笑话。徐光启上奏折报告皇上:我“孤纵一人”,“将伯无助”,我只是“光杆司令”。皇上照例批示:“知道了,欵此!”搞到最后,徐光启灰心已极,上疏“乞骸”(辞职)。七十岁的徐光启累了,病了。空有“报国”之志,毫无实现之可能。徐光启是个清官,身无长物,囊无余资。死时薄棺一具,书稿数束而已。

后来,朝廷按他最后官阶大学士修了墓,有华表、石人石兽等等,但已掩饰不了他的身后凄凉。时耶、命耶!光启生不逢辰,成了皇权专制制度的牺牲品。不过,光启留给后世的,连同他人品和诸多业绩,足可使他在九泉之下,瞑目自豪。

如果您愿意,可以到上海“光启公园”的纪念馆去看看,这里陈列着《几何原本》《崇祯历书》《农政全书》《唇言》……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赛举办20周年之际,明起刊出一组《发明记事》。

徐光启「练兵」

陈乐民



夜光杯

偶读唐诗

陈鹏举

王维《渭城曲》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杨柳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注:这首诗是王维送别诗的名作,也是唐人送别诗的名作。这首诗原题“送元二使安西”,最晚在中唐,这首诗被谱曲传唱,命名为“渭城曲”、“阳关曲”了。这首诗前后两联失粘,是绝句演进中的“折腰体”。诗中“杨柳春”一作“柳色新”,后者流传更广,从音色和文字上看,更清新、干净。这首诗的好处,历来说是在“西出”二字:阳关已经很久了,而安西更在阳关外。这首诗感动了读者千百年,其实不只在“西出”。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无所谓在哪里的。紧要的是,要和至爱亲朋在一起,即和“故人”在一起。“故人”就是人的故乡。送别为什么是伤怀心事?因为送别是“故人”的分离。这首诗说到的“西出”,还不能感动千秋,致命的是“无故人”。“无故人”的境地,是伤心的境地,是连酒也喝不醉的境地。这首诗其实还说了一个伤心人。这个人就是王维自己。他没有远行,可他送别了可以一起醉酒的故人,也到了“无故人”的境地。

王维《秋夜曲》

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空房不忍归。

注:乐府歌辞。全诗流动的是秋夜的声音。月亮、夜露、薄衫、银筝,还有“未更衣”和“殷勤弄”,说出了秋夜,也说出了女子内心的清凉。末句是秋夜和秋心的深深裂痕。“空房”其实是空空的心情,“怯”和“不忍”,让这一夜所有的声色,定格成了哀怨。这首有说是王涯写的。应该是的。这首首了一种丰盈,更像出生在唐。(四十八)

1976年9月2日,我约了7名青工一起去咱们厂青工学农的大本营——嘉定县马陆公社邓乔大队单生产队捉蟋蟀。下午3时,我们或调休或混病假或提早开溜,分头骑自行车集中于陝西北路上海市教育局边门,然后像武工队下乡那样奔向马陆。那年头的青工都很单纯,也没读过什么书,众人将捉蟋蟀这档事看作盛大的节日。我兴奋地说:“三国演义和水泊梁山里有威震天下的五虎将,我们厂则有闯荡天下的八大将,这次出征争取多捉几条恶虫,在上海滩威风威风!”

当年到了真如已是郊外,何况车辆稀少,我们放眼溢光流彩的田野,快活地唱起了革命歌曲《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送进游泳馆的“爱心”

毛煦静

游泳课结束了,孩子们在游泳馆的大厅里集队。我准备清点人数,上车回校。

穿过人群,走到自己班的队伍前,发现小杰有些异样,一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对着我。我一边点起前排的人数,一边用余光观察。果然,小杰以为我没在看他,就飞快地动了动了几下嘴巴。噢,在偷吃啊!我走到小杰跟前,看到了他攥在手心里的香蕉皮。“不是说好……”话刚

要出口,小杰的奶奶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下子挤到我的面前:“呵,老师啊,孩子游好泳容易饿,送点水果来!”

因为全年级的孩子一起集队,大厅显得特别拥挤。奶奶雕塑般站在小杰身边,笑咪咪地拎着游泳课的布袋。其他班的老师看出了我的尴尬,朝我会意地挤挤眼睛。面对这样的“爱心大使”,真没辙!

说起小杰,其实是个蛮有悟性的孩子。可在班里,却总跟不上集体的节奏。这样布置的事儿吧,他偏偏那样完成,拖拉起来没完没了。最绝的一次是去年春游,一个人一声不吭去买水,害得全班同学到处找他。幸好被同校的其他老师发现,安全送了回来。

老师对你说

一堂游泳课,成了一面家庭教育的镜子。有的家长不仅把它当成孩子强身健体的锻炼课,还当成一次磨炼团队意识,培养自主能力的良机。有的家长却这也放不下,那也甩不开,事事担心不已。有的家长更爽气,索性交张假条,让孩子靠边观摩。

高尔基说过,爱孩子是母鸡都会的事。当我们看到母鸡在惊慌时扑棱翅膀,雄鹰在天际自由翱翔的时候,心中会想些什么呢?



鸟鸣枝头(中国画) 金砚石

至凌晨3时半,我们的战绩上升了,但肚子早已咕咕叫。大伙又摸到镇上,总算找到一家门虚掩着的饭店,便窜进去点火煮面,吃饱再返回田间,连续作战。凌晨5时多,早早起床的农民去耕种自留地,他们发现有人钻在田里,立即大声喝道:“啥人,到佃地来做啥?”吓得我们如丧家之犬,抱头鼠窜到公路上。

马陆捉蟋蟀

秦维究

由于马陆主要产水稻,从来不出大蟋蟀,我们折腾了一个通宵,除了一位绰号叫“大宝”的青工捉到一条“黄头白青”外,其余人捉到的都是苍蝇的哥哥。然而,我却欣赏到了黎明中的农村风光:一轮旭日将田野、河流、村庄映照得红彤彤的,水牛犁田的

中国话剧在上海崛起

朱少伟

一般来说,中国话剧以1907年2月春柳社(中国留学生文艺团体)在东京成功上演《茶花女》第三幕为发端。然而,它的发展和勃兴,则是在申城。

上海开埠不久,外国教会便纷纷前来开办学校。教会学校在举行家长招待会时,为活跃气氛总要让学生表演“Drama”(西洋戏剧),剧本根据莎士比亚、莫里哀等的作品改编,台词皆用外文来念。1898年12月,圣约翰书院的中国学生仿照“Drama”的形式,用中文自编自演《官场丑史》,它虽仍有不少套用传统戏曲的东西,但无唱功、无做

功,而且穿时装、演时事,所以汪仲贤感叹“由此发现了戏剧舞台的新天地”。学生演剧之风很快吹入中

国人在沪办的学校,如1900年南洋公学的学生编演《六君子》《义和团》,1905年民立中学的学生编演《捉拿安德海》等。这些都成了“新剧”(也称“文明戏”,即早期话剧)的先声,并预示着一种外来艺术将被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新样式。

1907年秋,由于受春柳社数月前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的影响,王钟声在上海成立春阳社,并创建培养“新剧”人才的通鉴学校。随即,春阳社在南市永锡堂和兰心大戏院演出《黑奴吁天录》,该剧有较完整的幕剧本,全部用口语对白,被视作“话剧在中国”的开场。翌年春夏间,在日本参加春柳社排演的任天知返抵黄浦江畔,与王钟声合办通鉴学校,接着又排成根据英国哈葛特同名小说改编的《迦茵小传》,上演于春仙茶园,该剧基本符合“Drama”的要求,把“话剧的轮廓做像了”。

清末民初,上海的“新剧”活动颇盛,顺应时代潮流的《秋瑾》《家庭恩怨记》《黄金赤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频频上演,一些文艺社团也开始职业化。五四运动后,随着“爱

事”,欧阳予倩的《浚妇》、郭沫若的《聂莹》等陆续在申城舞台亮相;其中戏剧协社首演于1924年的《少奶奶的扇子》,被茅盾评价为是“中国第一次严格地按照欧美各国演出话剧的方式来演出,有立体布景,有道具,有导演,有舞台监督”。

1928年4月,洪深在沪出席同仁聚会时,为区别于主要用歌舞道白表演故事情节的传统戏曲,提议把主要以对话和动作表情达意的戏剧样式“Drama”译作“话剧”。从此,这一剧种在中国有了大家认可的固定命名。

退休生活琐记

杨逸明

一簞清淡一瓢纯,消遣流年善养身。量压尚容诗入梦,测糖已减酒沾唇。留连天上逢新雨,寻觅书中见故人。朗月斜阳不须约,自来去若芳邻。

美剧”(也称“真新剧”或“白话剧”,即现代话剧)的兴起,民众戏剧社、戏剧协社、辛酉剧社、复旦剧社、南国社等相继在沪诞生,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田汉的《获虎之夜》及《名优之死》、洪深的《赵阎王》及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浚妇》、郭沫若的《聂莹》等陆续在申城舞台亮相;其中戏剧协社首演于1924年的《少奶奶的扇子》,被茅盾评价为是“中国第一次严格地按照欧美各国演出话剧的方式来演出,有立体布景,有道具,有导演,有舞台监督”。

1928年4月,洪深在沪出席同仁聚会时,为区别于主要用歌舞道白表演故事情节的传统戏曲,提议把主要以对话和动作表情达意的戏剧样式“Drama”译作“话剧”。从此,这一剧种在中国有了大家认可的固定命名。